

沈航
著

辛亥革命时期 浙江之社会变迁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辛亥革命时期 浙江之社会变迁

沈 航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之社会变迁 / 沈航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308-14370-7

I. ①辛… II. ①沈… III. ①社会变迁—研究—浙江省—近代 IV. ①K2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3073 号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之社会变迁

沈 航 著

责任编辑 傅百荣

封面设计 姚燕鸣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46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370-7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序

沈航博士以浙江辛亥革命为题的论文顺利通过答辩，现将出版，我感到欣慰。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以及这一过程的复杂与多面性，使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历久不衰。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重要的节点，是近代中国自戊戌变法开始的政治变革进程的一个结果。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已开始认识到体制对国力发展的影响，维新思潮涌起，遂有戊戌变法发生。虽由顽固守旧势力强大而归于失败，但待到顽固派之倒行逆施酿成庚子之祸，国将不国，而不得不再次启动社会政治变革——“清末新政”，也不过在数年之间。而这个变革力度远过于戊戌年的“清末新政”，却是由当年反对维新变法的守旧势力的首领来推动了。真乃形势比人强。

但当新政进展到变革政体——“仿行宪政”，则又遇到了阻力，随着变革进程的启动，清王朝统治集团害怕果行宪政将危及其统治特权的态度也逐渐显露。亲贵集团对军权的独揽，对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制和“皇族内阁”的建立，明显暴露出清廷对这一政治变革的敷衍、拖延和防范汉人的用心。于是，原先曾力图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立宪派人士也绝望地别其而去。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已人心丧尽的清王朝极端孤立，顷刻瓦解，一朝覆亡。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成功地将政体转变为共和政体。所以，辛亥革命是由戊戌变法开始的中国社会政治转型进程的一个结果，一个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而非归于失败。推翻清王朝，初步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的框架，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功了，而辛亥革命所初步建立的共和政体的巩固和完善，当然由后人的继续努力来完成。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法王权专制制度实行了千年之

久的社会,不能指望一个辛亥革命就将对于中国人来说全新的民主共和体制牢固地建立起来。看看辛亥至今,时间又走过了100余年,我们就知道如何评价辛亥革命才比较公道了。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均造成重要影响,带来深刻变化。但以往人们对政治方面关注得更多,相形之下,对其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的关注则略显不足。而且,在流行的观念中,革命与暴力常密不可分。革命往往意味着武装起义、血腥的战争、残酷的杀戮,等等。其实,即使激烈的暴力革命中或亦蕴含着理性与温情。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变迁,人类社会的复杂的多种面向,逐渐为人们关注,渐次显露出来。这又应了那句话: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沈航博士刻苦读书,勤于探索,令人赞许。此著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视角,探讨了当年浙江辛亥革命进程中种种事迹的某些侧面,发掘辛亥革命对社会生活的种种改变,有助于人们丰富关于辛亥革命和浙江社会变迁的认识,具有值得肯定的学术价值。

沈航博士经过系统、完整的专业训练,矢志史学事业,有追寻历史真相强烈愿望。作为老师,希望他以此项研究为开端,继续不懈努力,不断开拓进取,为史学研究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李学智

2014年仲夏

摘 要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推翻了中国延续 2000 余年的君主专制政体,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由崛起至腾飞的新纪元。通过对湖北、江苏等省辛亥革命进程的研究,以及对浙江辛亥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分析,辛亥革命的意义还在于是中国近代以来将西方因素与中国传统因素较好结合的成功范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条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原则的理性革命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利用较小的代价,彻底进行政治体制变革,以此促成高速率社会转型的完成。

本书对浙江社会变迁的研究主要从闪现在辛亥革命中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因素入手,通过对浙江辛亥革命时期的满汉民族关系变迁、政权政局变迁、财政状况变迁、风俗变迁、民众心态变迁等几方面开展研究的。

浙江光复后,满汉矛盾突显,浙江军政府在满人藏匿枪械、投毒以及集体闹事的危急情况下仍旧能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态度应对,较为平和地平息了骚乱。骚乱过后又能对满人多加照顾,切实保护满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在生活上,浙江军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救济满人,从发放饷银到鼓励满人自谋生计,再到开设工厂,组织满人学习生存技能。而浙江军政府的行为也最终得到了满人的认同,满汉关系得到缓和。满人与汉人和睦相处,满人逐渐融入了汉族主流社会。

浙江光复后,随着清政府在浙江统治的垮台,浙江革命党人开始按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构建革命政权。浙江革命党人通过对军政府的三次改组,以及运用理性原则化解军政府与军政分府之间的矛盾,稳定了浙江政局。到 1912 年底,浙江军政府不仅取消了军政分府,统一了浙江的行政权,而且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促进了民主共和新浙江的发展。

浙江光复后,财政危机逐渐显现。浙江军政府开展了追缴前清官员吞没官款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人依据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原则,根据法律原则对抓获的官员进行审判。虽然效果不佳,但实践了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为进一步解决财政危机,浙江军政府通过发行军用票、公债,以及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等措施,最终带领浙江民众走出了财政危机。值得提出的是,商界中的钱业与典当业也为稳定浙江社会经济秩序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在社会风俗变迁方面,浙江军政府进行了移风易俗的活动,以期破除清代以来留存于世的恶习。军政府不仅以理性原则推行剪辫运动,而且下定决心铲除危害浙江数百年的烟毒与赌博恶习。此外,浙江军政府还取缔了为害社会的丐头。通过军政府的努力,在全省境内禁绝了鸦片,而且还严厉打击了赌博行为,使浙江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此外,浙江军政府还在省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先烈纪念活动,通过对先烈的纪念,不仅温情回望了先烈的丰功伟绩,还以此为手段,宣传了民主共和思想,促成了民众意识的变迁。

关键词:浙江辛亥革命;理性;温情;人道主义;社会变迁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缘起	(1)
二、学术史回顾	(4)
三、思路与结构	(7)
四、关于资料	(8)
第 1 章 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的光复模式	(10)
1.1 辛亥革命中的西方因素与中国传统因素	(10)
1.2 辛亥革命的湖北模式、江苏模式与浙江模式	(15)
第 2 章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满汉民族关系变迁	(21)
2.1 杭州光复之役满人伤亡情况统计	(22)
2.2 浙江光复后满人生活状况与满汉关系	(28)
2.3 浙江军政府对满人的救济与满汉民族秩序的重建	(33)
第 3 章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政权政局变迁	(38)
3.1 浙江军政府的建立与第一次改组	(38)
3.2 蒋尊簋“督浙”与军政府的再次改组	(44)
3.3 浙江军政府与军政分府的矛盾对立与化解	(48)
3.4 绍兴军政分府与浙江军政府的矛盾与对立	(58)
3.4.1 王金发的家世及其奔放不羁的性格	(58)
3.4.2 王金发与秋瑾的革命情谊	(61)
3.4.3 浙路事件中的汤寿潜及其与“秋案”关系	(64)
3.5 军政分府的撤销与浙江军政府的第三次改组	(66)
第 4 章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财政状况变迁	(74)
4.1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财政状况	(74)

4.2 辛亥浙江光复后的财政状况	(82)
4.2.1 浙江军政府追缴前清官款	(83)
4.2.2 浙江军用票与浙江地方公债的发行	(90)
4.2.3 税收制度的完善与财政危机的消除	(96)
4.2.4 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商界的作为	(99)
第5章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移风易俗活动与社会变迁	(104)
5.1 辛亥革命后的剪辫与留辫问题	(104)
5.1.1 剃发与汉人满人化政策	(105)
5.1.2 民众与浙江光复时期剪辫活动	(108)
5.1.3 浙江剪辫活动的沉寂及原因	(112)
5.2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禁烟运动	(116)
5.2.1 禁烟法令的推行与禁烟局的开设	(116)
5.2.2 禁烟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与《浙省禁烟条例》的颁行	(121)
5.2.3 浙英禁烟交涉与辛亥时期浙省烟患的禁绝	(127)
5.3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军政府禁赌问题	(132)
5.4 浙江军政府取缔丐头	(142)
第6章 辛亥革命后浙江先烈纪念活动与民众意识变迁	(149)
6.1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先烈的革命事迹	(149)
6.1.1 浙江省内的旧式会党与光复会的建立	(150)
6.1.2 大通学堂与浙皖起义	(152)
6.1.3 浙江光复时期诸先烈事迹	(157)
6.2 民国初年浙江的先烈纪念活动	(159)
6.2.1 徐陈马三烈士迁柩沿途各省的纪念活动	(160)
6.2.2 浙江省内的三烈士纪念活动	(164)
6.2.3 陈伯平烈士生平诸事考	(167)
6.2.4 秋瑾烈士的纪念活动	(176)
6.2.5 先烈纪念活动影响的扩大与民众意识变迁	(179)
结 语	(184)
参考文献	(187)
索 引	(195)
后 记	(199)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浙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遗产。5000年前的河姆渡文明展现了浙江先民无尽的智慧与创造力;春秋时期勾践演绎的卧薪尝胆则诠释了古代浙江人的不屈精神。近代以来浙江出现了一大批为中华崛起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鲁迅、周恩来等人都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身上无不闪烁着浙江人优良的品质与坚毅性格的光辉。在浙江潮的荡涤下,浙江紧跟时代潮流,将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文明相结合,造就了现代浙江经济文化的大繁荣。与全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轨迹一样,浙江近代史研究走过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浙江的近代史研究主要集中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俗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与“三次革命高潮”中,研究成果政治性、理论性较强,且较为分散,并未从整体上对浙江近代历史进行梳理。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化范式”、“冲击—反应模式”、“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等各种研究范式的引入,以及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兴起,浙江的近代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徐和雍、郑云山、赵世培等编著的《浙江近代史》是第一部全方位介绍近代浙江历史的著作,可谓浙江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该著作将先前零散的研究成果合一,以区域地方史的方式,第一次对近代浙江进行了整体的研究。此后浙江近代区域史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近年来随着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发展,浙江民国史研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2006年,浙江省成立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着重对浙江历史文化、浙江人文内涵进行研究,其中民国浙江史研究作为该工程的重心,得到了进一步重视与系统研究,一套民

国浙江史研究丛书得以陆续出版发行。该丛书涵括民国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人物等各方面,是民国浙江史的重要研究成果。然而在探讨民国浙江史的过程中,很少有学者关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浙江经济社会的变动,尤其是对辛亥浙江光复时期的转型与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学者涉及较少。他们关注更多的是政治斗争与杰出人物的事迹。社会转型不仅只是政治体制的变革,也不只是少数杰出人物的所作所为能决定的,社会转型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的背景,是一个社会整体的大变动。在这个转型中,我们不仅可以探讨浙江光复时期经济金融变迁、民众的日常生活等涉及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方面,还可以探讨新旧文化对民初浙江社会的影响,更可以探讨政治体制变动后浙江军政府的作为与浙江政局的变动,也可以研究其中代表性人物的思想与作为。总之,民国浙江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尤其是浙江辛亥革命时期的整体历史应当值得我们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进行研究与探讨。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宁波被迫开埠,浙江缓慢地开始了社会转型的过程。随着西方侵略的不断加剧,温州、杭州等地相继开埠,西方元素进一步进入浙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西文化在浙江产生了巨大的碰撞,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尤其是在移风易俗方面,新旧文化、新旧习俗的冲突表现得极为明显。如浙江民众中有部分人对剪掉拖在身后数百年的辫子依依不舍,都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的结果。此外面对鸦片盛行的情况,浙江军政府厉行禁烟,设立禁烟局,派出禁烟员,对省内的鸦片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清查。在遇到英国鸦片问题时,浙江军政府不畏外交压力,本着维护国家主权与民众意愿的原则,将英国鸦片禁绝入境。此外,浙江军政府也能较好地推进禁赌活动与取消丐头的活动。在政治体制变革的过程中,浙江军政府通过重建政权组织,在浙江构建起了三权分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并理性地处理军政府与军政分府之间的矛盾对立,完成了浙江政权的统一。在经济发展方面,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发展又是紧密结合。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转型的速度越快,深度也越大。从洋务运动到辛亥前夜,浙江的经济迅猛发展,现代化程度较高。然而辛亥时期,浙江财政危机出现,极大地影响了浙江金融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浙江军政府遂通过追缴前清贪官欠款、发行军用票与公债、建立健全税收制度等方法对财政进行整理。在浙江各界民众的帮助下,浙江终于摆脱了财政危机,推动了浙江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军政府在追缴前清欠款时能人道主义地对待欠款的官员,能以资产阶级法制原则进行审判,是浙江革命党人探索法制的最初尝试。在对待满汉民族关系方面,浙江军政府本着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方针,在浙江光复期间劝降旗营,给予满人生活费,并积极筹划满人生计。在满人聚众骚乱的事件上,军政府也极力安抚。经过军政府的努力,辛亥革命后,浙江满人逐

渐融入汉人社会,满汉民族秩序得到了重建。在对待先烈的问题上,浙江军政府温情回望诸先烈的革命事迹,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三先烈纪念活动、秋瑾女侠纪念活动等先烈纪念活动,并设置浙江先烈祠对先烈进行褒扬。浙江军政府的行为不仅褒扬了先烈、宣传了共和思想,使民主共和观念进一步深入浙江民众心间,还震慑了此时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前清贵族。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浙江革命党人秉承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原则进行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的实践。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概念是近代以来从西方新近传入中国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西方资产阶级崇尚人、关怀人、注重人价值的一种启蒙思想,是人逐渐解脱封建主义与宗教权威的体现。鸦片战争后,这种思想被中国知识界的一些精英所接受。尤其从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到此后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中国精英将以上元素与中国传统因素中的某些因素,如“和为贵”因素相结合,其实就是以注重人的价值、关怀人、维护最广大民众利益的表现,这就是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还需指出,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因素与“和为贵”等中国传统因素的影响并非辛亥革命时期历史进程的主流,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推翻清王朝,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仍是通过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暴力手段取得的。在极少数地区,则是通过立宪派、旧官僚的“伪光复”实现的。因此浙江辛亥革命的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仅是推翻清政府,顺利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一种特例。浙江辛亥光复模式可以称为浙江模式,亦可称为理性革命模式。

这种模式是一种不同于湖北枪炮革命的模式,更是一种不同于江苏瓦片革命的模式。浙江的辛亥革命在进行过程中首先通过暴力手段震慑清朝浙江当局,其是不以杀伤满人为目的,仅仅通过军事压力迫使满人投降。暴力过后,浙江革命党人便派人劝降旗营。最终,杭州旗营和平缴械,杭州宣告光复,随即浙江全省光复。与湖北模式与江苏模式相较,浙江模式是成功的,它的成功在于通过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在浙江的统治,彻底扫除了清廷余孽,为建设民主共和的新浙江开辟了道路。它的成功还在于,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速率很快,对浙江本省的破坏微乎其微,这为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民国时期浙江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故此,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视角,从辛亥光复时期浙江模式的特点切入,以社会经济的变迁为中心,对浙江光复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呈现辛亥时期浙江社会经济的全貌,解释辛亥革命后浙江迅速发展的原因,而且还能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拓宽更为广泛的空间,更能深刻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在辛亥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时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获得对辛亥革命不同的认识。就时间范围而言,本书基本以1911年至1912年

为限,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向上扩展至明末清初,向下延伸至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在区域范围上,主要涵括浙江省,部分问题研究区域扩展至湖北、江苏、上海、湖南、福建等省市。

二、学术史回顾

学界对浙江辛亥革命政治史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包括对政治性团体光复会的研究以及对浙江籍革命先烈的研究,所出的研究成果颇丰。对光复会的研究如郑云山的《光复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胡国枢的《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杭州出版社 2002 年版)、朱顺佐、李永鑫的《光复会》(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谢一彪的《光复会史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等。在对辛亥革命浙江人物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对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蔡元培、陈其美、章太炎等人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如郑云山的《秋瑾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欧阳云梓的《秋瑾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谢一彪的《徐锡麟评传》(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陶侃、谢一彪的《会稽之子——陶成章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等。在对浙江辛亥革命整体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成果也颇多,如徐和雍、郑云山、赵世培等编著的《浙江近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汪林茂的《浙江辛亥革命史》(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金普森主编的《浙江通史》晚清卷、民国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钱茂竹的《辛亥革命研究文集》(中华书局 2001 年版)。此外沈雨梧的《浙江近代经济史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陶士和的《浙江民国史研究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潘国旗的《民国浙江财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等著作的部分章节对辛亥时期的浙江进行了研究。但学界对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社会经济变迁的论著较少,研究成果也散落在以上各专著中。近年来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经济社会变迁的代表作如沈晓敏的《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以政治制度变革为切入点,对浙江的变迁进行研究。邵晓芙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浙江民变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从民变的视角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此外赵晓红的《从反帝到反清:由浙路运动看辛亥革命之社会基础》(《浙江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1 期)从民众运动的角度揭示了浙江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变迁。王月昀、邵雍的《辛亥革命后杭州的社会变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从辛亥革命后浙江军政府推行的政策与近代文教事业发展等角度考察了杭州的变迁。拙作《辛亥革命后的剪辫与留辫问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浙江学刊》2013 年第 3 期)从新旧文化冲突的一面考察了辛亥光复时期浙江的社会变迁。

从现有研究浙江近代史的学术成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就研究领域与研究范畴而言,现有成果所涉及的专题不多,关注角度多侧重政治事件的解读,政治团体的演进与发展,以及对政治人物生平事迹的叙述与考证;二是就其研究的时间段而言,多重视 1912 年之前的十几年或者之后的几年,而对浙江辛亥革命时期,1911 年末到 1912 年间浙江社会变迁的研究较少;三是就所研究的空间而言,多集中于省会杭州,对浙江其余地区的探讨与研究较少。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史料的限制,但以上成果毕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社会经济变迁提供了宝贵的基础与研究的支撑。

在涉及社会变迁的道路选择方面(在研究辛亥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框架构建上),马勇的《超越革命与改良》(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为研究辛亥时期中国的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在其《1911 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一书中,其提出了对辛亥时期历史应该温情回望的概念,这个新概念的提出为今后研究辛亥革命史做了框架上的构建与方向上的指引。在涉及具体史实研究方面,学界从经济变迁、政治变迁、思想文化变迁、日常生活变迁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在涉及思想文化变迁方面,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对辛亥革命的影响程度,将中国传统文化纳入到研究辛亥革命发生的思想根源上去。研究成果如章开沅的《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历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章先生的文章为辛亥革命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考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涉及日常生活变迁上,剪辫问题、禁烟问题、改装易服问题等方面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尤其是身体史概念的引入,深化了辛亥时期社会变迁的研究。如李喜所的《“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社会科学研究》2001 年第 6 期)探讨了辫子的政治内涵与民初的剪辫运动;程为坤的《民初“剪辫热”述论》(《社会科学研究》1987 年第 3 期)、陈生玺的《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上)》(《渤海学刊》1995 年第 3 期)、陈生玺:《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下)》(《渤海学刊》1995 年第 4 期),此三文整体地探讨了民初剪辫运动。侯杰、胡伟的《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学术月刊》2005 年第 10 期),该文从身体史的政治因素角度对剪辫问题进行了细致探讨。此外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与《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两书细致地探讨了清末剪发易服等问题。在涉及辛亥时期禁烟与社会变迁的问题上,张志永的《辛亥革命与禁烟运动》(《史学月刊》2002 年第 12 期)将辛亥革命时期的禁烟做了一个细致的研究。王宏斌的《禁烟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部分章节涉及辛亥时期的禁烟问题。此外的学者多重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禁烟研究,对辛亥时期的禁烟与社会变迁的研究略显不足。在涉

及禁赌研究方面,冀满红、刘文军的《清末广东谘议局与禁赌》(《历史档案》2006年第2期)将清末广东咨议局的禁赌工作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毛克明的《清末广东禁赌的措施与成效》(《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以1911年广东的禁赌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清末广东禁赌的酝酿,禁赌的主要措施以及禁赌的成效和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广东在历史转型时期的社会状况。马运瑞的《试论晚清政府的禁赌主张与措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介绍了清末进行的禁赌活动以及其失败的原因。毛克明的《民国初年广东军政府的禁赌问题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介绍了广东军政府在民国初年的禁赌实践。在涉及民族关系与社会经济变迁方面,就满汉关系变迁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的探讨较为深入。如常书红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以满汉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在辛亥革命的广阔视野下以满汉关系为中心探讨了满汉文化融合与中国社会变迁。贾艳丽的《辛亥革命中的满汉关系》(《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探讨了辛亥时期满人与社会变迁。在涉及辛亥时期财政经济状况变迁方面,一些学者研究了军政府财政问题,如潘国旗的《民国浙江财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章简要研究了辛亥浙江光复时期的财政问题。《近代中国国内公债研究1840—1926》(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三章介绍了北洋时期的国内公债问题。《近代中国地方公债研究——以江浙沪为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部分内容介绍了辛亥光复时期江浙沪地区的公债问题。此外,李天松、陈祯琰的《湖北军政府初期的财政措施》(《江汉论坛》1983年第10期)介绍了湖北光复时期的财政状况。刘永生的《贵州军政府的财政》(《辛亥革命与贵州社会变迁——贵州省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2001年10月)部分内容介绍了辛亥时期贵州的财政问题。潘健的《辛亥革命后的福建财政探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介绍了辛亥时期福建的财政状况。

此外还有专题讨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专著,如张静如、刘志强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之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社会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社会阶层与阶级、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会意识等几个方面对北洋时期中国的变迁做了系统的探讨。此后张静如、卞杏英主编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之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继承了上一部著作的模式,对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此两著作开辟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史研究的先河。在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变迁方面,朱英的《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从政治变迁、经济变迁、思想文化变迁、教育变迁、城市变

迁、农村变迁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进行的剧烈变动。此外还有大量的论著相继出版发行,这也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三、思路与结构

本书论题的展开主要是以浙江光复时期的社会变迁为线索,以浙江光复时期闪烁的温情、理性与人道主义为视角,重新解读浙江光复时期的历史。这主要是因为浙江的光复与全国各地的光复模式不同,浙江走的是一条理性革命道路。理性革命是一种轻暴力重温情的革命,轻暴力是指光复活动不仅仅以暴力为主要手段。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暴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但单纯依靠暴力革命,虽能彻底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但对社会秩序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有着消极的作用。重温情指的是夺取政权后,在对待清政府的各级官员与满人的态度方面,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民族关系与清政府遗留的社会问题。在进行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中,也采取上述方式。轻暴力重温情的策略能在彻底清算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不会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重大破坏,而且对光复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本书第一章就是以以上思路展开的。着重探讨辛亥各省光复的模式,分为湖北枪炮革命模式、江苏瓦片革命模式、浙江理性革命模式三种类型。第二章介绍浙江满汉民族关系变迁,着重考察浙江军政府对满人的态度,以及满汉民族秩序的重建问题。第三章介绍辛亥革命后浙江政权政局变迁,着重对浙江军政府构建三权分立的政权机构及对浙江军政府与军政分府矛盾对立、理性化解矛盾的措施进行分析。第四章介绍辛亥革命时期浙江财政状况的变迁,着重指出辛亥浙江光复时期财政危机的渡过是通过军政府的理性应对与民众的温情参与而取得的。第五章介绍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移风易俗活动与社会变迁,主要包括剪辫、禁烟、禁赌等问题。第六章介绍辛亥革命后的先烈纪念活动与民众意识变迁。以上各章有的展现了浙江辛亥革命中理性的一面,有的展现了革命中人道主义的一面,有的则展现了温情的一面,正是各章的结合才勾勒了辛亥革命后浙江社会的巨大变迁。

浙江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蕴含了多角度、多层次的丰富内容,在勾勒这一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时,本书将着重突出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浙江辛亥革命时期闪烁在浙江社会各个层面上的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因素。主要表现在:(1)浙江的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因素形成的浙江理性革命模式,使得浙江在光复后能在社会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彻底扫除前清余孽,为建立起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新浙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浙江的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因素,使得浙江在满汉民族关系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能缓和矛盾,继而建立起新的民族秩序,这对建立

五族共和稳定的新浙江有着积极的意义。(3)浙江的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因素,使浙江在新旧文化冲突的过程中能调和矛盾,促使民众接受新文化,抛弃旧的、落后的文化习俗。第二,浙江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变迁史,不仅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为此后中国人民探索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财富。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以现有浙江辛亥革命时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运用辛亥时期的《汉民日报》、《全浙公报》、《越铎日报》等报刊,对辛亥浙江光复时期的社会变迁进行细致研究。涉及范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关系等问题,修订、补充了辛亥革命浙江史研究的讹误与缺失。其次,第一次运用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视角看待并解释辛亥革命,通过对浙江的个案进行分析,揭示了辛亥革命在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最后,总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即中国政府只有将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原则融入政府治国理念之中,竭力维护民众的最大利益,这样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关于资料

就本选题的资料而言,本书参考了大量的报刊资料、档案、文集、回忆录、地方志与日记等史料。(1)报刊资料:如《汉民日报》、《越报》、《越铎日报》、《全浙公报》、《申报》、《大公报》、《民立报》、《民国日报》、《共和言论报》、《东方杂志》、《浙江军政府公报》、《临时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浙江省通志馆馆刊》、《逸经》、《浙江青年》、《浙江省建设月刊》、《钱业月报》、《越风》等。(2)档案史料:浙江省档案馆、绍兴市档案馆、嵊州市档案馆等馆藏及已经辑录出版的《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辛亥革命杭州史料辑刊》、《嵊州市档案馆藏浙军都督汤寿潜函卷》、《绍兴军政分府文件辑存》、《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等档案资料。(3)回忆录等资料丰富,均为辛亥当事人之回忆,如《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集、《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辑、《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首义回忆录》、《回顾录》、《我在六十岁以前》、《吴玉章回忆录》、《李平书七十自叙》等。(4)各种文集:如《孙中山全集》、《章太炎全集》、《林则徐全集》、《康有为全集》、《蔡元培全集》、《黄兴集》、《陈黻宸集》、《董仲舒集》、《毛泽东选集》、《高旭集》、《秋瑾集》等。(5)地方志:如光绪《永嘉县志》、康熙《会稽县志》、嘉庆《山阴县志》、道光《乐清县志》、道光《会稽县志稿》、光绪《上虞县志》、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民国《杭州府志》、《绍兴市志》等。(6)年谱和日记:如《孙中山年谱长编》、《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曾国藩年谱》、《蔡元